

蒙文通先生治学的“体系”意识

◎ 刘兴淑

【摘要】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主张“学问贵成体系”，这是他的治学心得，也是其治学的目标。蒙先生的这种“体系”意识既表现为对诸多学术领域的溯源明变，又表现为融各领域为一体，体现出蒙先生治学的真精神。

【关键词】 蒙文通； 治学； “体系”意识

【中图分类号】 K03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【文章编号】 1008-0139(2010)03-0000-47

“学问贵成体系”，博通儒、释、道三教，在中国文化的经学、理学、史学、民族、宗教、地理等诸多领域辛勤耕耘一生，并作出卓越贡献的蒙文通先生(1894——1968)，将学问的体系比作几何学上点、线、面、体的“体”，并以这四个概念来区分学问家成就的高下。他说：

学问贵成体系，但学力不足、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。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、线、面、体的“体”。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短钉之学，只能是点。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，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，可以算是线，还不能成面。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、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，自成系统，纲目了然，但也只限于一面。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，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。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。^{〔1〕}

蒙先生认为，清代大部分学者的学问，琐屑孤立，无关宏旨，即使精致，价值不大，只能算作“点”的学问；象段玉裁之治《说文》，能在某一分支领域，上下通贯，前后自成系统，可称作“线”的学问；

能在某一学科领域，视野广阔，通贯纵横，自成系统，纲目了然，堪称“面”的学问，他所敬仰的两位老师——“实为近代推明今古学之大匠”^{〔2〕}的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和创办支那内学院并培养了熊十力、汤用彤等诸多佛学大家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——分别于经学、佛学，便达到了“面”的这一层次；而治学的最高境界是“体”，即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见和突破而又自成一体，既面面俱到，时有创新，又融会贯通，这是所有学问家应该追求的目标。

在这幅学问成就的层次图中，蒙先生认为做学问只有达到“体”的境界才是真学问，“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”。综观蒙先生的整个治学历程，正是怀着这种做真学问的气魄，怀着这种“体系”意识，他才在儒家思想及其经学、理学以及史学、佛学、道家道教等诸多学术领域成就卓著，成为一代国学大师。

儒家思想，是蒙先生的学术之根。他认为：“儒家思想于中国二千年之历史影响至巨，不明儒家思想，不足以明二千年之国史，从宋明理学则又探究

〔作者简介〕 刘兴淑，四川省社科院哲学所，助理研究员、博士，四川 成都 610071。

儒家思想之本根。”^[3]蒙先生在这一领域的论著较多,尤其是1944年《儒学五论》的结集出版。虽然,

“儒之学,修己以安人,达以善天下,穷以善一身,内圣而外王,尽之矣”,但“自学失其绪”,孔孟之学似乎不再参与济世淑人,“世亦以儒为无益于人国也”^[4],于是蒙先生奋而作“五论”,加以申说。

上篇“本论”部分,我们可以看到《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》和历时近十年、屡加改益的《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》两文,体会到蒙先生那种“所谓‘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政’,师门之训、忠恕之道,守之不敢逾”^[5]的儒者风范,虽然,“其大端具于是”,但“事不孤起,必有其邻”,蒙先生附上了另三篇相关儒学论文而广为“五论”。应该说,这“五论”不仅具备了儒家思想的大旨,还论及了儒学的历史文化源流,可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。

蒙先生“又以究儒史相资之故,别附四篇,以明其变。于是儒者之经济思想、社会思想,亦可考见。”^[6]这是下篇“广论”部分。“本论”、“广论”既各成系统,又主次明晰,衔接紧密。二者结合,成为一个整体。“于学之始末、道之精粗,其统绪略可寻。入出于百氏,上下及千载,推昔人之陈说,示大法于将来。坐而论之,可起而行之,斯固师门之旨耶?”^[7]孔孟之道的内圣外王之意、经世致用之旨已然具备。蒙先生“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而做学问的气魄由此可见一斑。

儒家经学,是蒙先生治学的基础和起点。他早年曾师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、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,又曾向章太炎等人问学,有着深厚的经学根底,其在经学方面的功底深得廖平师的赞誉:“文通文如桶底脱落,佩服佩服!将来必成大家。”蒙先生认为,经学是中华民族的无上之法典,它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、政治风习等各个方面。他批评近代以来以西学之学科分类来衡量经学,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的巨大力量和巨大成就。论影响,儒家经学远远超过诸子,包括诸子在内的子、史、文艺等学,都不可与经学相抗衡。

在梳理中国经学发展史时,蒙先生认为,近三百年来的学术,是复古运动,是把从明代直到孔

子的学术,逐次复古一番,由明代王阳明的狂禅而复于宋代之朱学,由宋学复于汉唐,由东汉古文学复于西汉今文学,又从西汉进一步复于周秦。由此,与经学复古回溯的路向相反,蒙先生循历史发展的足迹,从经学起源、周秦、两汉、南学北学,到宋明、清近代,探讨了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。

他对西汉经学评价很高,“经学莫盛于汉”,“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”^[8],认为西汉今文经学不仅是子史之中心,而且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,主张破弃两汉经师的今、古文家法,将汉代经学与周秦儒学划分开,以周秦为宗,上追晚周儒学之旨(这也是对廖平“弃两汉,宗周秦”思想的发挥)。对清代今文经学,蒙先生的评价没有对西汉经学的高,他对廖平以礼制分今古的一派表示认同,而对其中继承西汉今文经学、讲《公羊》学的一派提出较多批评,这是与对西汉董仲舒今文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。

在治经过程中,蒙先生指出了历史上今、古文问题争讼的实质,揭示廖平师以礼制平分今古的重大意义;提高传记的地位,认为经表传里,义理与证据不偏废;指出治经学的目的在于明道,而明道则须通过明注、明传、明经来完成,从而把明道、讲义理建立在明传注、重证据的基础上;治经与政治紧密联系,以经学的形式来阐发儒家之革命论、平等说等政治思想,并深刻揭示出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。^[9]

蒙先生治经,其经学思想虽如其师廖平一样几度变化,但其宗旨不变,只是历史的研究。^[10]因“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”,^[11]蒙先生也是把经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待的。一方面,这个有机整体是自成体系的,自有其源与流;另一方面它是开放的,因为它与诸子学、政治、史学、佛学、道学等领域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;同时,就蒙先生本人的治学方式而言,他治经而不泥经,由经入史,经史贯通,推治经之法以治佛、道二典,这都说明,蒙先生的经学也是一个有机整体。

史学领域,是蒙先生学术整体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,有两条线:一是传统意义上按时间分的中国史学,如周秦、六朝、两宋:一是与其他学科交叉

的分支史学,如民族史、地理沿革史、地方史、经学史、宗教史、佛教禅宗史、道教史、经济史、思想社会史等。两条线非截然分离,而是互相交叉。

蒙先生治史,主张通观、明变、贵识。在纵的方面,他说:“孟子说‘观水有术,必观其澜。’观史亦然,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。……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,才能把历史说个大概。”^[12]“言古必及今”而“言今必自古”,“必须通观,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”^[13]在横的方面,“事不孤起,必有其邻”,同一时代之事,必有其“一贯而不可分离者”。^[14]他注重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去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。

《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》一文,是“史以明变”观点的代表作。“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,即以读诸子之法读史,这样才能抓得到历史的生命,不然就是一堆故事。”^[15]蒙先生治史,更多的是从思想家的角度切入的。

在纵览中国史学史时,蒙先生认为,“窃以中国史学之盛,有三时焉。曰晚周,曰六朝,曰两宋,皆思想廓落之会也。”“舍此三时,虽有纂述,才记注耳。”^[16]“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、六朝、两宋为盛,余皆逊之。于此三段欲稍详,余则较略。”^[17]因此,蒙先生论传统史学,是既有通论,又有详论,博、约结合,以见历史发展脉络和时代精神。

在研究周秦民族史时,蒙先生探寻了周秦时代西戎、赤狄、白狄诸民族先后迁徙之迹。受西洋史的启发,将地理、民族、文化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,并结合我国古史传说,爬梳中国古代民族可以江汉、河洛、海岱分为三系,既而指出文化亦有三系的看法,从而打破了关于传说时代的传统看法。《古族甄微》、《古地甄微》、《古学甄微》,正好概括了蒙先生史学中种族、地理、文化三个重要元素。蒙先生晚年对包括巴蜀在内的南方民族史特别关注,其绝笔之作《越史丛考》,回答了南方民族史的若干重要问题,充分体现了蒙先生深切的现实关怀。

蒙先生还借助于《山海经》、《汲冢书》等古史“奇书”对上古时期的地理沿革进行了考证,无论是早年提出“古地三系”说,还是晚年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昆仑宜为上古一文化中心,巴蜀文化当系自西

向东渐,楚文化也受巴蜀文化的影响,《山海经》就是“巴蜀地城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”^[18]等著名学术观点,对于巴蜀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都有着重要意义,而这些研究都是同民族史及地方史的研究紧密结合的。

研究宋史时,蒙先生是将历史与学术思想和社会、经济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考察的。他研究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,考察宋代的经济状况,辨析王安石变法(他称为“熙丰变法”)、分析了宋学的发展源流,指出北宋主要有新学、洛学和蜀学三派,“故论北宋之学,必以此三家为巨擘。虽不能尽括一代,而其余竟为枝叶也。”“北宋三家,惟苏氏能不废史学”^[19],只有三苏蜀学重史,而王安石新学偏于制度、二程洛学则重于义理。

对于南宋史学,蒙先生尤为重视,甚至把它称为治史的“轨范”或“统绪”。他说:“经学莫盛于汉,史学莫精于宋”,“汉代经术以西京为宏深,宋代史学以南渡为卓绝”^[20],并明确表示:“余少年习经,好西汉家言。壮年以还治史,守南宋之说,是皆所谓于内圣外王之事,无乎不具也。”^[21]他认为,南宋浙东史学是一个渊源于北宋洛、蜀、新学三家,可分为义理、经制和事功三派、传承至明的一大完整的史学流派。^[22]

道学领域,是蒙先生治学“体系”中的又一重要子系统。虽然蒙先生致力于道家道教研究起步较晚,但他在这一领域却影响甚大。一方面,源于蒙先生在对“代表巴蜀文化”的《山海经》系统研究的基础上,解释了“五斗米道”在四川发源的原因,并断言“五斗米道”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宗教;另一方面,蒙先生在羽流丹鼎符篆之外另辟道史蹊径,在梳理道教流派时,特别注重其思想内涵,取得了几大突破性研究成果:

1. 划分先秦道家南北二宗,打破了当时严复、蔡元培等人所持的“庄周与杨朱为同一人”的看法。

2. 探讨重玄学派历史,认为是唐代的成玄英,而不是五代的杜光庭,最先以重玄思想去注释老子;揭示了重玄思想的精细微妙及道教与佛教中

观、天台、禅宗的关系。“重玄学”极重思辨，综括儒道释三家，比魏晋玄学调和儒道更进一步，经成玄英之疏，使重玄一宗臻于极盛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都有重要影响。近二十年来对“重玄学”的研究成为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，足显蒙先生的开创之功！^[23]

3. 对道教溯源追踪，证说神仙之事，已见于晚周，提出“五阶三变”的道教发展划分之说，深研陈抟学派的心法、剖析唐宋金元道教思想的异同，其条分缕析，精微深刻，令学者中人叹服。其对陈抟学派的研究尤为出人意表。^[24]

佛学领域，也是蒙先生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。20世纪20年代，蒙先生进支那内学院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法相唯实学，其深厚的佛学素养深得欧阳大师的赏识。在内学院，蒙先生与熊十力、钱穆、汤用彤等人常常相聚，从宋明理学到佛学，又从佛学到儒学，相互争论极为激烈。解放后熊十力在致蒙先生的信中称“文通要为二三知己中之最”^[25]，认为蒙先生最能懂其学问。

蒙先生的佛学专论，主要有两篇：《中国禅学考》和《唯识新罗学》。前篇发表于1924年，包括两部分：第一部分对争论不休的禅宗传承世系加以考察，采取先破后立的方法，考察达摩前二十六祖不足据，而初祖达摩应为萨婆多部五十四世；第二部分辨析古禅与今禅，意在证明慧能之中国禅学是与印度禅学毫无关系的“今禅”。后篇发表于1937年，主要是考察唯识之源流学脉，通过对玄奘、窥基、圆测三家学说的考证和比较，认为窥基、圆测本自不同，前者行于中土，后者盛于新罗，但可用学统传承将这些异同贯穿起来。这两篇论著，充分反映了蒙先生佛教经史考证方面的过人识见和境界。除此之外，蒙先生尚有分别发表于1948年的《坐忘论考》和1958年的《道教史琐谈》等文，论及佛教对道教发展的影响^[26]。

宋明理学，是蒙先生“究心”于一生的领域，自称“诸学中自得之深者惟理学”^[27]。“虽不专攻理学，而于宋明儒书数十年中读之实未尝稍间岁月也。”“自少年时服膺宋明人学”，到“晚岁乃独契

于陈乾初”，“平生于理学之大有进境者三”。蒙先生尝说“读宋明书，悉优游涵泳，反复嚼咀，于其义之未得者，辄精思苦索，忘废寝食，不贵其多或速”，“自家这点认识，皆从心思极苦中来”。^[28]

蒙先生直接论述理学的著作不多，且多为笺注心得，正如其在《治学杂语》中所说“有些著作，看似零散、无系统，其实是自有系统的”，其理学思想虽几度变化，却有一隐然思路，即“皆折中归本乎孟氏”^[29]。他认为儒家道统自孟子之后不曾断裂；认为《大学》深得思、孟之旨，至阳明《大学》之义尽，洙泗之蕴得以充分阐发；他既看到了理学内部程朱派与陆王派两派之间的区别、儒家与佛教的差异，又倾向于折中两派，糅合儒、释。因此，作为心性之学的宋明理学，不仅在蒙先生的人生修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而且贯通其整个学术思想、自成一统。

综上，蒙先生的学问，无论是于儒家思想及其经学、理学领域，还是于史学、道学（道家道教）、佛学领域，皆各成体系，既溯源明变，又颇多创见，同时又能触类旁通，由此及彼，融会贯通。

在儒、释、道三教思想方面，蒙先生承传了宋代蜀学三教合一的特点和传统，立足于儒学，系统梳理和研究了道学和佛学，特别是对陈抟学系的渊源分析，揭示了道学和儒学（理学）的内在联系；论述道教三论（派），即重玄论、坐忘论、全真派与佛教三宗，即中观宗、天台宗、禅宗紧密的相对应的渗透及基本发展线索，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三教渗透互补的特征。三教合一思想是蒙先生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。生活在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跌宕起伏的时代，处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旋涡，作为深受传统学术熏陶的蒙文通先生，其三教合一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、社会根源和现实根源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在经史关系方面，蒙先生不赞成其师廖平“严分经史”的观点，而主张经、史贯通。因“传统史学，本于儒家”^[30]，“儒史相资于不穷，为变不可极”，^[31]蒙先生将治经的方法和成果运用于史学研究，同时也将史学研究的经验融入治经的过程，因而经、史相得益彰。比如：考据这种方法，无论在经学发展过程中，还是在史学研究上，其作用都是决

不可忽视的。有人把它归为经学,有人归之于史学。蒙先生则认为:“考据是工具学问,经、史都用得着,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。”^[32]

在经史与诸子、与佛、道二教关系方面,蒙先生虽视经学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,却能会通诸子,并将严密的经史考证方法用于研究佛、道二藏。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《儒学五论》则是评史论政的名世之作,本汉代经师之言,以会通晚周诸子,其“立论颇恢奇,远超出一般经学的今古门户之见。……不拘陈说,不守藩篱,自成一家言。”^[33]在研读佛、道典籍的过程中,蒙先生指出:“于注经之家即足以见各派之宗旨”,“至于道教,何独不然,未有一派之中无人注《道德经》者,于此考之,而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亦略见于是也。”^[34]通过考证注《道德经》之家,就可见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。就是借助于这种方法,蒙先生“挖掘”出重玄宗,发现并整理了大批已经失传的汉唐两宋时期的道书,并整理出《道书辑校十种》,为今天学界研究道学重玄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;蒙先生的两篇佛学专论能有精辟见地,也得益于这种经史会通的方法。

在文、史、哲关系上,蒙先生认为,哲学是处在中心位置的,尤其对史学而言。他说:“哲学发达之际,则史著日精,哲学亡而史亦废。”^[35]他强调历史的思想性,并作为自己治学、教书的指南,“几十年来,无论是讲课、写文章,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,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。唐君毅说:‘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外还有一个道理。’丁山说:‘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。’这虽显有推崇之意,却也符合实际。”^[36]蒙先生认为,“文化”的变化,不是孤立的,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,因此必须从经学、史学、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,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。^[37]只有以联系的观点,将文、史、哲结合起来,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,通过前后左右的纵横考察,才能比较全面的观察文化的变化,揭示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。

总之,在“堂堂正正地做个人”的治学前提下,蒙先生主张“学问贵成体系”,这种“体系”意识既贯通于他治学的诸多领域,又融各领域为一有机的整体,体现出蒙先生治学的真精神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[12] [13] [32] [36] [37] 蒙文通.治学杂语[A].蒙默.蒙文通学记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93.2-3, 1, 6, 38, 6, 33.
- [2] [8] [11] [14] [16] [17] [19] [20] [21] [30] [35] 蒙文通.经史抉原[A].蒙文通文集(三)[M].成都:巴蜀书社, 1995.120, 470, 211, 403, 222-223, 417, 316-317, 470, 473, 241, 222.
- [3] [18] [28] [29] 蒙文通.古学甄微[A].蒙文通文集(一)[M].成都:巴蜀书社, 1987.132, 65, 132, 132.
- [4] [5] [6] [7] [31] 蒙文通.儒学五论自序[A].川大史学·蒙文通卷[M].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06.188, 189, 189, 189, 188.
- [9] 蔡方鹿,刘兴淑.蒙文通经学与理学思想研究[M].成都:巴蜀书社, 2007.
- [10] 斯维至.文通先生是历史学家,也是思想家[A].四川联合大学.蒙文通教授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纪念册[C].1994.
- [15] 胡昭曦.谆谆教导,受用终生——缅怀文通师[A].四川联合大学.蒙文通教授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纪念册[C].1994.
- [22] 粟品孝.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[J].浙江学刊,2005,(3).
- [23] 刘复生.通观明变,百川竞发——读《蒙文通文集》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[J].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.2004,(6).
- [24] 罗映光.蒙文通道学思想研究[J].四川大学博士论文, 2006.
- [25] 蒙文通,熊十力,等.理学札记与书柬[J].中国哲学,第5辑.北京:三联书店,1981.
- [26] 李晓宇.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中的经学问题.宗教学研究.2006,(4).
- [27] 龚谨述.蒙文通先生传略[A].蒙默.蒙文通学记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93.189.
- [33] 萧蓬父.含英咀华,别具慧解——蒙文通先生《理学札记》读后[A].蒙默.蒙文通学记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93.91.
- [34] 蒙文通.道教史琐谈[A].中国哲学,第4辑.北京:三联书店, 1980.

(责任编辑 李远国)